



廣西人民反洋教斗争

6.8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

庾裕良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

庾裕良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3.75印张 79 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号: 11113·60 定价: 0.62 元

序 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海禁被打开，腐败的清王朝无法阻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进行疯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它们所控制的基督教及其守旧派——天主教，曾经充当了帝国主义者发动掠夺殖民地战争的“马前卒”、“别动队”。它们的“传教士”中的不少人在我国土地上犯下了种种罪行。记述和分析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势力的各种活动，对于理解帝国主义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我国近代史上，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反抗。历史上所说的“教案”，就是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教会和“传教士”的种种罪行案件的简称。但是，关于广西各地“教案”的详细记述，特别是科学分析，寥若晨星。庾裕良同志的《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1856年至1900年间，广西各地发生的主要“教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对“教案”的本质有较深刻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形成“教案”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民因宗教信仰、习俗不同，抱着排外的情绪一概反对西洋宗教，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传教士闯入国境进行不可告人的非法活动。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的。

本书把近代史中的“教案”问题，作为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整个斗争的一个侧面、一个组成部分来把握、来叙述的，这是本书的长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基本消灭。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极大提高，由于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的长期存在，以及与此相联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原因，宗教的影响还在一部分人中长期存在。我们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对待宗教信仰这种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我国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宗教方面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回顾近代史上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宗教势力的种种罪行，对于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将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对于十九世纪的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不但青年一代不了解，就是多数中年人和老年人也未必清楚。本书对“西林教案”、“贵县三板桥教案”、“上思教案”、“凌云县乐里教案”、“永安教案”等的起因和始末，均有精到的探索，翔实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反帝斗争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分好教材。

范 阳

1984年1月12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西林教案	1
第一节 历史背景	2
第二节 马奥斯汀潜入西林	5
第三节 马奥斯汀在西林的罪行	7
(1) 小恩小惠拉拢群众	8
(2) 破坏风俗干涉婚姻	9
(3) 软硬兼施强迫入教	11
(4) 包庇坏人干涉政事	11
第四节 马奥斯汀触律被杀	12
第五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16
第六节 西林教案的性质和影响	19
第二章 贵县三板桥教案	23
第一节 贵县成为传教基地	23
第二节 时代背景	26
第三节 法国传教士在三板桥的罪行	28
(1) 出租放债重利盘剥	28
(2) 强迫教徒改变风俗	29
(3) 阻止群众参加援越抗法活动	29
第四节 教案的经过	31
第三章 上思教案	34
第一节 法国传教士在上思的活动	34

(1) 精心经营米强	35
(2) 建立教徒村庄	36
(3) 在上思州城建立教堂	36
第二节 上思教堂成为暴乱指挥所	37
第三节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40
第四章 凌云县乐里教案	46
第一节 天主教传入乐里	46
第二节 时代背景	47
第三节 传教士横行霸道	49
(1) 阎王租	49
(2) 讨命债	50
(3) 夺魂工	51
第四节 游维翰为民除害	51
第五节 游维翰被害	55
第五章 永安教案	60
第一节 永安州的历史沿革和斗争传统	60
第二节 罗天生引狼入室	62
第三节 苏安宁在永安州的罪行	64
(1) 无耻的煽动	67
(2) 强迫教徒改变习俗	67
(3) 禁讲“番粘米”	69
(4) 包庇坏人把持地方政事	71
(5) 伤风败俗玩弄妇女	72
(6) 私设公堂肆意行凶	73
第四节 教案的经过	76
(1) 苏安宁恃势挑衅	77
(2) 黄政球义愤“起团”	79
(3) 李亚安奋勇诛凶	80

(4) 古排塘联合抗暴	82
第五节 教案的结局	92
(1) 威逼妥协	92
(2) 勾结出卖	93
(3) 就义反抗	97
结 论	105
后 记	110

第一章 西林教案

西林县地处广西西部边陲，与云南、贵州交界。境内层峦叠嶂，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开发较晚的山区。据有关志书记载，直到宋代才开始建制，属上林峒；明初改为上林长官司，隶庆远府，皆为土官世守；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因土官亡故无嗣，并于泗城土官；崇祯六年（1633），境内河西六甲又为云南广南土官依绍周所并；从此诉讼不息，民不聊生，纷纷外迁避难；清康熙三年（1664年），乃命滇黔粤三省会断，几经周折，磋商经年，终以上林长官司旧地改土归流^①，建西林县，隶于思恩军民府^②，县治设于豷角村。全县辖十二甲、六十村，壮、瑶、苗、彝、汉各族杂居其间。县境东西为340里，南北为360里，至府城1100里，至省城2800里。^③征赋民田约106顷。除设知县、典史等官员外，只有守备一员、千总一员、守卒193名。即使简陋如此，经费尚难自给。其偏僻穷困情况可见一斑。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不顾传教士的安危，不计后果，派遣传教士马奥斯汀（Lepère August Chapdelaine俗称马

① 县内主要官员改世袭制为流官制。即县官由上级委派。

② 治所武缘（今武鸣）。

③ 大约根据当时盘回的山径里程计算。

赖)潜入广西。选定这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山区“传教”，显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第一节 历史背景

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和英国经过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法国殖民主义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丧失了全部北美辖地及印度大部分领土，野心勃勃的法国东印度公司也因而解散。但拼命向外扩张的法国大资产阶级却不甘心落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后面，千方百计地在远东寻找新的殖民地以作补偿。越南和中国因而成为它的新目标。越南被他们称为“法兰西皇冠上的一粒新明珠”。中国西南各省也被视为幻想中的“伟大法兰西东方帝国”的一部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挖空心思，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许多传教士，也被利用成为法国殖民事业的支柱和先锋。法国传教士在越南的肮脏活动，早已臭名昭彰。而他们之中奉命转向中国“宣讲圣教”、“传布福音”的所谓传教士也是一丘之貉。

十八世纪中叶，越南黎氏王朝的内讧延续多年，而农民起义的烽火也愈烧愈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阮文惠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击败郑氏、阮氏两个实权派之后，终于推翻了黎氏王朝，建立了新的阮氏朝廷。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阮文惠死，其子阮光纘继位。新旧阮氏政权又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搏斗。内讧时常是外侮的导火线。这时，在越南窥测方向的法籍教士伯多禄(Pigneau de Behaine)见下手的时机已到，而且看准了旧阮余孽阮福映是一条忠实

的走狗，毅然将赌注押在他身上，极力诱迫他投靠法国，借法国势力恢复王位。他还自告奋勇，携带阮福映的长子到法国恳求援兵，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法王路易十六提出建议：

“目前，在印度政治势力的抗衡上，似大有利于英国人。如果认为恢复均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实在说，如果考虑这个国家的出产和它的埠口的位置，我们便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则无论平时战时，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打击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商业——这是无论如何都要做的——或削弱它的商业。……由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将不难妨碍英国人显欲将边界更向东扩张的计划。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但是在将来将更为重要。这些利益就是这个国家的天然富源以及从此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所将获取的莫大利益。建设通往中国中部的商道，将使我们获得那人们不认识的国家的财富。”^①

伯多禄的建议由于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向远东获取补偿，并从中摧毁、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商业活动的野心，立即为路易十六所接受，进而拟定了“东方帝国”计划。几经密谋，又由伯多禄代表阮福映和法国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路易十六将派兵协助阮福映夺取王位，而法国则获得土伦港（即今岬港）、昆仑岛的主权以及在越南内地的贸易和航行权。但事有不巧，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路易十六自顾不暇，无力派兵帮助阮福映。伯多禄却

① 张雁琛译：《1787年伯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转引自牟安世《中法战争》16页。

迫不及待，自己募兵并从法国驻印度的军官处得到援助，到越南协助阮福映屠杀越南人民，打败阮光纘，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统一南北，号称嘉隆王。阮福映虽然获得了王位，但他却是越南沦亡的“始作俑者”，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伯多禄的赤膊上阵，尽管受到法国资产阶级的称赞，也在世人面前暴露了他不择手段为法国殖民主义效劳的狰狞面目。铁的事实说明，“传教士”、“主教”尽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庄严的称号，但一旦加入了殖民主义的肮脏活动，就成了一文不值的遮羞布。事实还证明，法国豢养的不只是一个伯多禄，早在十七世纪初期，法国传教士便以传教为名，深入越南各地从事资源调查和政治、军事活动，为军事入侵作了细致的准备工作，而在法国军队攻城掠地的紧张时刻，传教士们更是紧密配合，有的收集、提供情报；有的唆使越南教徒从事骚扰等破坏活动；有的赤膊上阵，为法军作向导或直接参加战斗。他们一直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得力助手。伯多禄代表阮福映签订的越法《凡尔赛条约》，虽从未获正式批准，但法国殖民主义者却始终紧握不放，当作依据。伯多禄提出占领越南作为掠夺我国中部资源的跳板的奏议，更没有因路易十六的下台而放弃。越南和中国西南各省，始终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两个掠夺目标。这就是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法国殖民主义者在积极吞并越南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派遣传教士进入广西等地“传教”的主要原因。

“西林教案”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节 马奥斯汀潜入西林

185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委派该会驻香港总会计李莫瓦（Le père Libois）为两广教区主教。他便千方百计派人进入广西。当时虽然教禁已开，但只准许在五口通商传教，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活动。所以，进入广西的几次尝试都未得逞，只知道有几名广东籍教徒流落在广西做生意，但无固定住址^①。1852年，马奥斯汀从法国奉派来香港，李莫瓦派他取道贵州去寻找进入广西的办法。1854年春天，马奥斯汀到贵州后，在法国传教士李翁士（Le pere Lions）的帮助下^②，从当地彝族教徒处了解广西西林县山区，有从贵州迁去的彝族农民，其中有三人曾经受洗奉教，其余的人常来往贵州和西林之间，和贵州彝族亲友过往甚密。马奥斯汀十分敏锐的注意到彝族农民之间朴实、亲密的情谊，可以利用。他立即在当地彝族农民中，物色同去广西西林的同伴。马奥斯汀用金钱收买生活贫困的山区农民，逐渐收到了效果，陆续有些人自愿陪同他前去西林。经过他仔细挑选，最后选中了白满、卢家两兄弟、巫老五，和一个年轻寡妇曹桂英。经过马奥斯汀积极教化，这几个人很快就受洗奉教。曹桂英受洗名为曹依立斯，很受马奥斯汀重用，将银钱开支交她管理。经过一阵准备，他们于1854年6月，打扮成彝族农民走亲戚的样子，从贵州到了广西泗城府（今凌云），随后转到

① 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和为贵（J. Cuènot）著《广西教史》第一章第六页，1925年，香港版。

② 和为贵著《广西教史》第一章，第七页。

西林县的白家寨，在彝族农民家中住下。

马奥斯汀潜入西林的目的，并不是宣传福音，拯救贫困山区人民的灵魂，而是谋求在广西取得立足点，以便逐步向省城（桂林）及广西各地发展。天主教南宁拉丁书院廖简生神父于1964年在明德街天主堂主教府的档案中，曾发现马奥斯汀于1855年9月在西林写给他驻香港的上司、两广教区主教的信，为他广西西林之行，提供了一些可信的线索。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教长：

请让我给你叙述有关你委托我管理的教堂的一些重要事情。正如你所想的，我向你叙述的事情是很少的。当我在罗神父家住宿时，他告诉我，他认识三个贫穷的鞋匠，后来都入了教。他们现住广西省城，并已将三人的通讯处给我。以后我当派一位传道士或者可靠的人去看望他们，观察他们是否能替教会效劳。假如不需用太多的费用，我还想叫他们前来我这里住一段时间，以便试探他们为教会做事的本领。我很着急完成这件事，因为那个省城的规模很大，最好是从三人中培养一个传道士或受洗者，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益的。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也需要好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目前还未计划好。请告诉我，你是否同意办这件事，我在二三月内，当再派人到香港向你报告。”^①

① 法国传教士马赖的许多信，原存天主教贵州教区圣彼得修道院。1877年法籍传教士桑弟格烈（G.B. Chantclair，西林一带称他陈神父）从贵州转来广西西林县一带传教时，曾在该院档案中全文照录。这些抄件后来作为珍贵的文件传到天主教南宁拉丁书院保存。但到1962年只剩数件。现存广西通志馆资料室。

这些抄件的第一页天头，都用拉丁文（Transumptum）注明为抄件，并写明是传教士马奥斯汀·沙德列（按：即马赖）自贵州板江

马奥斯汀的第一个立足点为西林，是由于从贵州兴义来广西，先在西林立足较为方便。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目标显然是广西的省城或其它城市。而马奥斯汀的入境，既未经有关部门同意，也未经地方当局办理入境登记，因而是非法的行为。马奥斯汀之所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入境，绝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虔诚，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法国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极力鼓励，帮助马奥斯汀这种非法的越境，则有它自己的算盘：如果马奥斯汀冒险获得成功，取得立足点后，迅速打开“传教”的局面，就可以为更多的“传教士”进入广西创造条件；如果马奥斯汀的冒险出了问题，法国就可寻找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谋求让传教士入境的优惠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奥斯汀的冒险入境和非法活动，为法国的军事入侵提供了条件。马奥斯汀本人也获得殉教的“真福”品级^①，梵蒂冈还给他最荣誉的“花冠”，并趁机向各处神职人员、教徒大肆宣扬他为天主献身的光荣。

第三节 马奥斯汀在西林的罪行

清咸丰三年夏（1854年6月），马奥斯汀穿着云南兴义

或大山等地发出的信，右上角有桑弟格烈的签名；信中难以理解之处，如马赖依照当地人口语将鸦片写作洋烟（yañt—yeñ），抄录者在信旁注明鸦片（Opiun）；信的末尾，有当时贵州教区主教李万美（Lions又译李翁士）“抄件与原件完全相符”的亲笔字和签名，并加盖贵州教区的钢印或印章；当时罗马教廷特派的法庭裁判F. M. Guichard也签字作证；最后又有抄录者桑弟格烈的签名。我们虽无法查对马赖的原信，但从上述抄录和签证的慎重情况分析，这些抄件是真实可信的。

① “真福”（Bienheureux）是天主教殉教的第二品级，第一品级是“圣人”。

地区彝族农民的服装，混在来广西西林探亲访友的彝族人群中，潜入西林县境。随后即利用彝族人民之间的各种关系，在西林的一些僻静山区以及黔桂边境的其他彝族居民点，开展所谓传教活动。他披着神父劝人行善的外衣，在西林一带做了许多坏事。有关这方面的记录、档案已荡然无存，幸好当地群众对这件不寻常的往事，创伤既深，戒心也大，议论不绝，历代相传，为后人留下了故事的梗概。另外，天主教传教士也留下若干记载，虽多溢美、掩饰之辞，也提供了不少线索。综合起来，有如下数端：

（1）小恩小惠 拉拢群众

马奥斯汀在西林山区住下之后，第一件要务，便是驱使从贵州带来的几个彝族教徒、传教员，向当地彝族农民及山区群众现身说法，宣讲天主教义，把天主说成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只要信奉天主，便可以免灾消难，即使死了也可以赎罪上天堂；向群众美化马奥斯汀是天主的仁慈使者，从很远的法国来西林山区，解救受苦受难的山区农民。为了拉拢那些对信教抱犹豫态度的人奉教，马奥斯汀亲自出马配合，干了许多收买人心的勾当。如当时山区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一有病痛，不是求神拜佛便是自采草药，绝少延医买药。马奥斯汀便乘人之危，向病者赠送一些价格低廉、疗效尚可的成药，装出一副问寒问暖、休戚相关的菩萨面孔，并不厌其烦地宣扬这是天主的关怀。因而，有的人心中虽然不信奉什么天主，但受人之惠，碍不过情面，只好参加了天主教，与神父、传教员虚与应付。

经过马奥斯汀和他的传教员的努力，不久在西林县的定

安、常井、板坡、那满、白家寨、瑶山村等地^①，陆续有人受洗奉教。人们并不非难其宣传教义，也不责备其送医赠药，而是谴责这种带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手段。

（2）破坏风俗 干涉婚姻

西林县的壮、苗、彝、汉族都有祀奉祖先的风俗，家设祖先神位，逢年过节烧香祭拜，以表达对亲人思念之情。马奥斯汀却将这种由来很久的风俗当作一种异端来加以反对。他认为敬奉祖先，就不能受洗入教；信奉天主，就不能同时敬奉祖先。他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神位，不准上坟拜祖。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宗族纠纷。马奥斯汀又往往纠集教徒、拉拢乡绅袒护一方，从而激怒了当地群众。新教徒白三，受洗后照例奉命回家拆除祖先神位，遭到父母及族中长辈指责，自己也觉得不能忘本，提出退教，又受马奥斯汀的斥责和压制。白三气愤不过，便联合一些要求退教的人，向县衙门告发马奥斯汀“宣扬邪教，煽动宗族不睦”的罪行。马奥斯汀因而受到陶知县的传问。但是经过重金贿赂之后，便以查无实据了案。马奥斯汀乘机 and 陶知县拉上关系^②。陶知县的贪财昏庸，大大助长了马奥斯汀的气焰。

马奥斯汀还粗暴干涉教徒子女婚姻，加之他私生活淫乱，更使群众反感。西林是民族聚居地区，男女婚姻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比较少，各族男女青年有较多的婚姻自由权利。而马奥斯汀却借天主教的“教规”加以限制，并趁机奸污女教徒。据西林定安等地的群众传说：马神

① 见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和为贵著《广西教史》，第二章第24页。法文本，1925年香港版。

② 和为贵《广西教史》第二章第24页。